

历史

清末留学教育人力资本思想的演变

朱孔京

【提要】清末留学教育是在近代列强侵略逐步加深,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被动进行的,也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出国留学而进行的各种议论、纷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清末留学教育思想,这主要有容闳的“西学东渐”,培养完全“西化”人才的留学教育思想;洋务时期的“中体西用”,培养富国强兵军事、民用人才的留学教育思想;维新时期的“变法图强”,培养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的留学教育思想;新政时期“奖励游学”、“以日为师”,培养新政所急需新式人才的留学教育思想。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各个时代的烙印,体现着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从简单的器物、技术到后来的制度、政策进而过渡到更深刻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着人们对西学认知和接受程度地加深。这期间,培养适应当时世界发展趋势的、具有新技术、新知识、新观念的人才一直是清末留学教育的主题。

【关键词】留学教育思想 西学东渐 中体西用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1-0125-05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 “西学东传”、向西方 学习的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从爱国御侮的角度出发,以开放的思想审视西方,开眼看世界,提倡经世致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用来抵抗外国的侵略,其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眼看世界,对西方的历史、地理、风俗、科技等进行介绍。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禁烟过程中,为了解西方,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组织人员在英国商人办的

《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新加坡自由报》,美国传教士办的《中国丛报》中取材,编译成《澳门新闻纸》。同时,他根据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主要内容是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概况。

第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最重要的特点,其中代表性的当属魏源。早些时候,魏源就在《圣武记》中提出要“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理论思想,又在随后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提出要“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思想,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在序言中,就明确提出了“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

^① 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4页。

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的主张。他指出“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②《海国图志》主张仿造西方战舰以及新式枪炮,改革中国的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提倡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号召商民兴办民用工业,认为“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立译馆翻夷书”,改革科举,“增设水师一科”等。^③

第三,开始介绍西方一些先进的政治制度。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介绍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以及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稍后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都对西方政治制度作了介绍,内容包括西方的总统选举、领导人事迹、议会设置、司法、宪法、三权分立现象等。魏源对西方政治制度十分推崇,而且客观地介绍和评价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极大地肯定了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他说美国的“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骏乎三代之遗意”,其中国家“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归,公器付之公论”,是“创古今未有之局”。^④

鸦片战争前后西学东传思潮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拓展了西学的传播空间,扩大了视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容闳的“西学东渐”,培养完全“西化”人才的留学教育观

“西学东传”推动了留学教育的开展,近代最先去国外留学的是容闳等人。1854年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由于他从小接触的是西方文化和西式教育,西方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俾遂予求学之志,……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⑤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主要在于中国当时的文明、文化落后于西方,因此只有引进“西学”,借西方文明之学术灌输中

国,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路。他留学教育思想的主旨就是“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⑥而当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那样,中国文明程度就会越来越高,中国逐渐就会像美国一样繁荣富强。“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⑦1863年,容闳被曾国藩邀到安庆帮办洋务,并结识了江南制造总局督办丁日昌,1868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条陈四则”,“条陈之一、三、四特假以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即“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材”,同时将派遣留学生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问题作了一个构想:“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可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二批学生出洋留学卓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⑧正是容闳的一次次努力,最终促成了早期幼童留美活动。

三、洋务时期的“中体西用”,培养富国强兵军事、民用人才的留学教育思想

早期幼童留美活动,除了容闳等人的努力

① 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序言,《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② 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6页。

③ 同上。

④ 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291页。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⑥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⑦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⑧ “条陈四则”:一、政府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容闳:《西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1~123页。

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支持和推动也密不可分，正是由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等人的努力，直接推动了船政学堂的留欧活动。综合这些洋务派官员的留学言论及行动，他们的留学教育人才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培养翻译、外交人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公使进京、总理衙门设立及洋务运动的展开，清政府与西方国家交涉事务日益增多，刚开始时，清政府聘用洋人，但聘用洋人有很多弊端，如耗资巨大，常遭洋人蒙骗等，“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事侍通事。凡关局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① 为培养自己的翻译、外交人才，清政府先后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在广州也设有同文馆，但仍不能适应日益增多、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所以派学生去外国学习语言文字，就成为解决外交人员短缺的一个应急措施。

其二，培养科技人才。随着洋务各项事业的兴办，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官员急需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科技人才，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自强”的主要方式是购买、仿造西洋枪炮和船舰，但这不是根本之法，因为“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② 要真正掌握西方科技，保证人才的需求，根本的途径还是派人到西方去学习，“今日讲求制造，亦不出两途：一则派人前往从学，一则开局延请教师”，出国留学“为将来必有之举”。^③

其三，加强海防建设。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都是从海上破门而入，朝野人士逐渐认识到建设海军、加强海防的重要性。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洋务派官员进一步认识到强化海防的根本良策，是要尽快培养出一批中国自己的驾驶和制造船舰的专门海防人才，1873年，沈葆楨正式奏请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窃以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

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功倍”。^④

四、维新时期的“变法图强”， 培养救国救民、挽救民族 危亡的留学教育人力 资本思想

1895年，甲午战败和丧权辱国的现实给晚清士人以很大的震动。许多改良派人士为救亡图存，疾呼变法图强。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1898年1月，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颇有感慨地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经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⑤ 梁启超也特别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在教育内容方面，强调“中西兼举，政艺并进”。^⑥ 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还要重视研究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它社会科学。后来随着变法的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他在《新民丛报》上明确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教育现代化的方针：“本着培养资产阶级‘新民’的宗旨，实行德育智育并举，采合中学与西学，兼行政法和艺学两科教育。”^⑦ 梁启超看到，要彻底改变中国现状，实现中国

① “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9页。

②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洋务运动》（二），第154页。

③ “李鸿章致总署函”，《海防档，机器局》，《洋务运动》（二），第18页。

④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军机处交出船政大臣沈葆楨抄折”，《海防档》乙，《福州船厂》，《洋务运动》（二），第473页。

⑤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⑥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

⑦ 宋仁主编：《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的近代化,必须把变革的希望转而寄托在社会中下层,主要希望通过创办教育和讲学,培养现代新民,提高全民素质。

五、新政时期“奖励游学”、 “以日为师”,培养新政 所急需新式人才的 留学教育思想

19世纪末,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形势,内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外部,随着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及“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而且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为维护自己的统治,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不得不颁布“变法上谕”,决定实行“新政”,要求清政府朝内朝外各类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①为此,1901年6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条陈“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其中特提“奖励游学”:认为去日本留学“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②因此,在当时“各省分遣学生出洋留学,文武两途及农工商等专门之学,均须分门肄习;但须择其志定文通者乃可派往。”并宜“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学师范,以备回华充各小学中学普通教习尤为要著。”^③对于学成归国后的留学生,张之洞等对这些人才也是非常重视,如果这些人拿到毕业证书回国,清廷对这些人进行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如果各省的士人“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国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④

与“新政”之前留学教育所不同的是,此时留学教育的国家及目的更加明确,更具有针对性,不仅倡导鼓励“游学”,而且从“人才”培养的角度,鼓励留学生积极进取,学有所成,取得“凭照”,回国后成为国家急需有用人才。而清政府对出国留学,特别是学成归来的“人

才”给予各种奖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1901年9月17日,清政府颁布“广派游学谕”,提出“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因此,各省督抚一定要选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遣往学习”,学成领有凭照回国,由各省“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各省“即行出具切实考语”,然后送到外务部“覆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如果是自费出国留学,学成得优等凭照回国,那么准许他们“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⑤自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形式的留学生被陆续派出,留日活动逐步开展起来,但留日刚开始时,由于两国间法律、习俗等诸多不同,“流弊甚多”,一方面一些学生出国后没有了约束,游玩而荒废了学业,使一些“有志之士,不复敢远游就学”,另一方面对于留学成绩突出的人,不能给予足够的奖励,起不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为规范留日学生的派出与管理,1903年10月6日,张之洞上奏“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章程折”,其中在“奖励游学生章程”中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凡毕业学生,首以品行贵,应请各学堂注重学生品行,与各学科一律比较分数,必所定品行分数满足乃为及格”。毕业年限“应与日本学堂原定本科毕业年限毫无短减。”在此基础上,“非在照办约束游学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程所定奖励。”^⑥张之洞提出的对留学生的约束特别是奖励办法,从留学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成为了

① 朱有藏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② “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③ 同上,第13页。

④ 同上。

⑤ “清帝广派游学谕”,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⑥ 张之洞:“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1页。

当时清廷制定各种归国留学生考核录用的蓝本。

清末留学教育是在中国近代列强侵略逐步加深，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被动进行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也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有有识之士的觉醒、启蒙和奋争，也有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还有普通民众的热情和盲从。但不管从哪一方面说，这是当时中国了解世界、走向世界迈出的坚实的一步，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一环。围绕着出国留学而进行的各种议论、纷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清末留学教育思想，这些又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体现着中国近

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从简单的器物、技术到后来的制度、政策进而过渡到更深刻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着人们对西学认知和接受程度的加深。这其中，虽然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留学教育进行了种种限制、控制，甚至阻扰，但培养适应当时世界发展趋势的、具有新技术、新知识、新观念的人才一直成为清末留学教育的主题，这些都为近代中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口
与劳动经济系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 俊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apital Thoughts in the Disputes on Overseas Educ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Zhu Kongjing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Western invasion in modern history, China was reduced to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step by step. In such a social background, overseas education was promoted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ploration of ways to save the nation and its people by some advanced Chinese people at that time. Various discussions on studying abroad generated abundant educational thoughts in late Qing Dynasty, including such thoughts as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proposed by Rong Hong that aimed to cultivate the completely “Westernized” talents,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advocated 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at aimed to cultivate personnel that could make the country both rich and militarily powerful, “Becoming stronger through political reforms” proposed in Reform Movement that attempted to cultivate the thought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as well as rescuing the nation from deep crisis, and the thoughts of “awarding those studying abroad” and “taking Japan as the teacher” in the New Deal period that were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urgently needed by the New Deal. All these thoughts demonstrate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imes, witnessing the changing tendency in modern China’s learning from the West that started with the direct learning of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y, then shifted to the learning of Western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nd lastly changed to the learning of profound Western ideas and conceptions. This tendency reflect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Western learning. Training talents who could adapt to the new world situations and could be equipped with new technology, new knowledge and new ideas had always been the theme of overseas education discuss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thoughts on overseas education;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